

国家风险——悬在投资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企海外投资——路在何方？本书试为您一解。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黑洞

国家风险

● 王巍 张金杰 著

GUOJIA FENGXIA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家风险——悬在投资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企海外投资——路在何方？本书试为您一解。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黑洞

国家风险

● 王巍 张金杰 著

GUOJIA FENGXIA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风险：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黑洞/王巍，张金杰
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

ISBN 978-7-214-04580-5

I. 国... II. ①王... ②张... III. 企业经
济-国际化-研究-中国 IV. F2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8083 号

出 版 人 刘健屏

选题策划 佘永松

出版统筹 刘 卫

书 名 国家风险：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黑洞

作 者 王 巍 张金杰

责任编辑 曹 斌

责任校对 丁 萍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580-5

定 价 29.8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简介

王巍 美国福特姆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任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

自1982年以来，曾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美国化学银行、世界银行、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任职。

先后直接策划和组织了中国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承销及并购业务，在创办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企业重组与购并操作等方面经验丰富。担任过多个部委和省市的政府经济顾问。

张金杰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跨国公司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跨国公司的理论与实践。近年来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专著），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动因分析》等诸多论文和研究报告。

出 版 人 刘健屏

出版策划 佘永松

出版统筹 刘 卫

责任编辑 曹 斌

责任校对 丁 萍

责任监制 王列丹

装帧设计 黄 炜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长期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特别要对书中所摘编的背景材料的原著者表示衷心感谢,因为这些背景材料是构成我们思考的重要基础之一。由于匆忙和疏忽,所引材料未能一一标明出处,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

王 巍 张金杰

要了解新形势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风险内涵及其防范,阅读本书是个有效的途径。

刘光溪(著名国际经济学者,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司长)

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成功取决于准确地把握国家风险,两位专家在本书中提供了与之相关的全部重要信息与历史背景。

Kenneth Davies(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王巍博士总是能够在中国商业进步的一些关键点上发出冷静独特的声音。《MBO,管理者收购》如此,《中国并购报告》如此,现在这本《国家风险》更是如此。

牛文文(著名企业评论家,《中国企业家》主编)

序言

笔者在二十年前曾出版过一本《国家风险》，希望协助国内业界了解国际投资者如何评估跨国投资的风险，从而能将当时吸收外资的热潮提升到理性地改善中国投资环境的阶段。此书颇受好评，以至于近年来仍然有许多陌生的朋友不断鼓励我再次修订出版。

如今，中国加入 WTO 整整五年了。国家风险的概念突然不期而至，迅速成为中国企业界新的热点。几家出版社同时提出希望我能重温旧故，再做思考。我与长期合作的学者张金杰先生讨论再三，欣然从命。花了大致一年的时间讨论并写作，终于在年底前完成这一稿。

读者可以看出，尽管国家风险的框架变化不大，但分析立场却是大转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市场的风险成为我们观察的重心。因此，许多立论就有了全新的角度。抚今追昔，不过二十年的光景，中国经济在全球投资市场上的地位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令笔者无限感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两家机构为本书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持。《中国企业家》杂志的申音先生和万盟并购集团的李斌先生也提供了智力贡献。笔者在此鸣谢。

本书的两位作者期望社会各界的批评,特此公布电邮地址如下:

王巍 wangwei@mergers-china.com

张金杰 jinjiezhang@sina.com

王 巍

2006 年 12 月 13 日

前言

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风险

● “走出去”战略步入荆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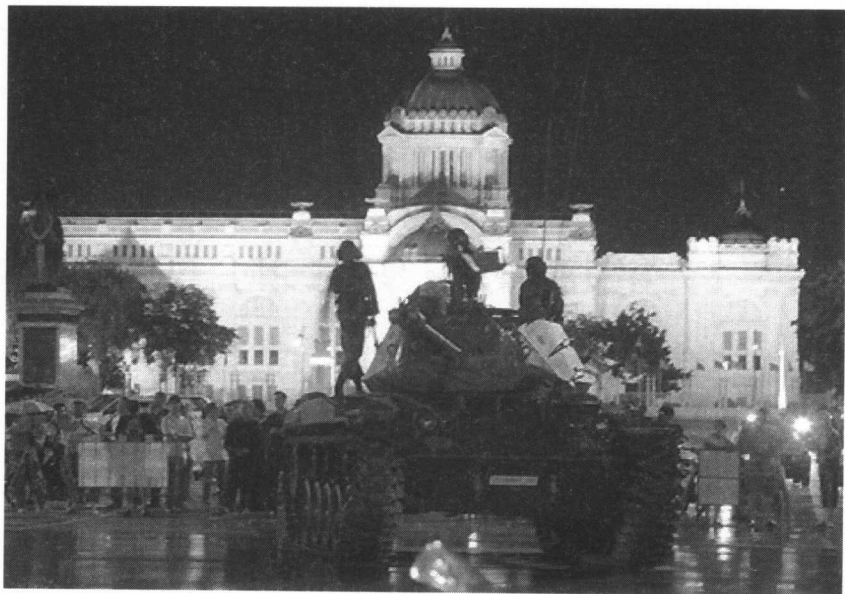
2006年9月19日晚十时许。

泰国首都曼谷,CHAOPHYA PARK 酒店。

正在陪同本书作者之一的 TCL 电子(泰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李明辉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一位当地朋友告诉他,曼谷刚刚发生军事政变,满载着军人的坦克已经包围了总理府,控制了电视台,并宣布建立临时政权。

一听此言,李明辉先生急忙打开房间的电视机。他这才发现,所有本地电视台已经全部中断正常节目,改为颂扬泰王的歌曲和军方的新闻通告,而 CNN 等国际电视频道的新闻节目也时断时续。

第二天早上八点,TCL 泰国公司总经理曾春新召开了紧急会议。显然,他领导的这家成立不过两年多的海外子公司正面临着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峻挑战。原计划几天后的9月21日和9月24日举行的两场酒店展会不得不暂时取消。



2006年9月19日晚,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图为泰国军队当晚包围政府大楼
(图片来源:路透社)

TCL 泰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马上意识到,政变将会对泰国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电视机销量的下降将不可避免,这将直接影响到以经营电视机为主的 TCL 泰国公司的市场利益。此外,由于政变 TCL 泰国公司还将可能随时面临因泰铢贬值而产生的汇率损失。

不过,这并非曾眼下唯一忧心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人身安全的问题。四天前,泰国南部合艾市发生了连环爆炸事件,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恐怖分子此前威胁说放置了五枚炸弹,但只有四颗爆炸,剩下未爆的一颗据说被放置在当地的一个市场内,而 TCL 泰国销售最好的宋卡府分公司恰巧坐落于此。

无独有偶,在地球的另一端尼日利亚,中国企业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2006年4月29日,一则手机通话透露,尼日利亚南部城市瓦里的一家炼油厂附近将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爆炸发生

后并没有人员伤亡,但爆炸的影响却直抵遥远的北京。

“我们想对中国政府和它的那些石油公司发出警告——远远躲开尼日尔河三角洲。”一个尼日利亚武装组织在给媒体的一封声称对此事负责的电子邮件中写道。“石油设施场所如发现中国公民,将视为小偷。中国政府投资于偷盗的原油,将它的人民置于我们的火线之内。”

这则警告是在胡锦涛主席访问尼日利亚之后发出的。在胡锦涛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国与尼日利亚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一项是尼日利亚政府向中国公司提供四张石油勘探开采牌照,而中国将在尼日利亚基础设施投资 40 亿美元。然而,墨迹未干,合作协议签订仅三天,便发生了这起爆炸事件。

自 2001 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对外绿地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甚至跨国并购、股权置换等都迅速发展,中国企业的身影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地,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脚步明显加快。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于 2006 年 9 月 8 日在厦门联合发布的《200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显示,200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12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 100 亿美元。其中新增股本投资 38 亿美元,当期利润再投资 32 亿美元,其他投资 52.6 亿美元。

截至 2005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 572 亿美元。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 2005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全球的

流量、存量为基期进行测算,200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 1.68%和 0.59%。

“2000 年至 200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 65.6%,但中国现在还不是对外投资大国。”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商务参赞赵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后 5—15 年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机遇期。”赵闯预计,再过 8—10 年时间,中国就可以成为对外投资大国。

难道高歌猛进的海外投资时刻即将到来了吗?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乐观。《中国崛起,风险增大》(*As China Rises, so does Its Risks*),这是一篇刊登在 2006 年 6 月号美国《财富》杂志上的专栏文章,政治风险咨询专家伊安·布雷默专门分析了中国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苏丹、伊朗等国的投资行为,并得出结论说,“由于同一些不稳定的国家进行交易,中国的全球投资策略正在付出代价。而且随着中国全球姿态的提高,代价也将提高”。

伊安·布雷默的话绝非危言耸听。中国企业大力开展跨国经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积极效应明显。但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大胆“走出去”,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规模都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一旦经营决策者对东道国包括政治风险、政策风险、经济风险等在内的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就有可能给企业自身包括母国经济带来系统性的危机与巨大损失。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时因缺乏国家风险防范意识,使日本经济承受巨大损失。到 1993 年,在日本银行对在美国投资不动产企业的 2 000 多亿美元贷款总额中,近一半成为不

良贷款。殷鉴不远,值得我们警惕。

● 国家风险,现在轮到中国了吗

国家风险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它不同于企业因自身问题所产生的经营性风险。国家风险是受国家政治、政策、社会发展、自然灾害等不由企业控制的外在因素所决定的风险,而企业经营性风险则是受资金、技术、决策等企业内在因素决定和影响的风险。但是,在国家风险与企业经营性风险二者之间,虽有本质的不同,却有很大的互为因果性的关联。

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古巴革命中,古巴新政权将美国巨额财产实行国有化。这一事件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高度重视,对于其海外资产因东道国政权更迭行动而产生的风险深感担忧。“国家风险”一词应运而生。

紧接着在上世纪 70 年代,由于第三次中东战争引发的国际石油危机对西方经济打击沉重,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14%,日本工业生产下降了 20% 以上,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工业生产都出现负增长。连尼克松总统也不得不惊呼:“我们正面临一场能源战!”

20 世纪 80 年代,所有拉美国家都被拖入债务危机之中。拉美国家不得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救济。此后,拉美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20 世纪 90 年代,海湾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东南亚出现金融风暴。

进入新千年之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如果从国家风险研究的角度而言,仅恐怖主义、单边主义,乃至令各国政府头痛的非典、禽流感等等问题,都足以使研究的视角大大拓宽,更不用说那些由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导致的日益突出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摩擦等一系列问题。

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家风险,而建立国家风险防范体系的难度也正在大大增加。这种基于上述事实的判断绝非危言耸听。

全球化的乐观主义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大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相信,扁平化的世界经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发展中国家也将从中获益,而它们的崛起也并非如许多“威胁论”者危言耸听的那样,令西方受损——但前提是后者不再停留在冷战思维和埋怨之中。同时,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恐怖主义和“邪恶势力”也同样将从变平的世界中受益,从而更难于防范。

毋庸置疑,国家风险是“全球化”的副产物。随着企业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主体。它们日益成为引发各国国家风险的“祸首”,成为将一国国家风险向别国乃至全世界进行传递的链条,并成为国家风险的最大的承担者和受害者。

仅从承担国家风险的角度,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美国,其跨国公司的感受也许的确与众不同。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1946年至1960年间被没收过12回,在1961年至1971年间被没收过101回,1972年至1973年间被没收过57回。而自1975年以后,能没收

的外国财产在许多国家已基本剥夺完。

除了资产可能被东道国国有化以外,对美国跨国公司而言,接下来最糟糕的就属遭受恐怖袭击。正如一位前美国大使保罗·布雷默所概括的:“在过去30年中,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中有80%是把目标对准了美国商业。”(《哈佛商业评论》,2002)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着良好的国际形象。但西方企业面临的国家风险问题,也应成为中国企业的前车之鉴,越来越多的与中国企业相关的案例正在说明这一问题。因此,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抓紧时间迫在眉睫的危险做好准备。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面临的国家风险形势相比许多发达国家的同行更加严峻。一方面,为了得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能源和其他资源,为了避开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对手,中国企业很多把“走出去”的第一站放在一些相对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

截至2005年底,约七成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集中于石油等资源性行业和制造业,而同属于这两个行业的企业占了二战后全球所有被“没收”的外国企业的六成;同时,中国目前已投资或将要投资较多的国家中,智利、秘鲁和坦桑尼亚分别“没收”过外国人财产26—35次,印尼、赞比亚和苏丹分别“没收”过15—25次,阿根廷、缅甸、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分别“没收”过5—10次。

显然,上述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属于拉美和非洲地区。在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计划继续加大对这两个地区尤其是拉美的投资力度,这一多达数百亿美元规模的海外投资计划如果成功实施,我们一方面为之兴奋,因为中国的对外投资终于登上一个历史性的新台

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由对如此规模巨大的海外资产的安全担心。

从全球国际投资的发展历史来看，目前，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资本占全球国际资本输出的比例，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还要低。

1913年，全球外资总额的50%流向当时的发展中国家，46%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外资只有15%流向发展中国家，80%的国际投资则是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无法有效保护它们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资本产权，不能不说是造成今天这一局面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因。

我们试问：中国能做得更好吗？

一些像伊安·布雷默这样的西方分析家认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随着中国海外资产日益受到发达国家面临的各类威胁，中国可能会把更多的投资分散到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美国 and 欧盟而言，这是个好事情。但是中国政府和企业还需要解决另外一些问题。

2006年9月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是《谁惧怕中国？》(Who's Afraid of China?)。该文是英国外事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re)刚刚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淡色中国》(Brand China)的节选。作者乔舒亚·库珀·雷默，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他的观点是，中国迫切需要重塑自己国际上的形象。中国看待自己与世界看待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而危险的差别，这已经变成中国政府亟待解决最大的问题之一。

雷默援引的多项最新国际调查表明，中国仍被视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的产品被认为是“没有技术含量的”、